

目 录

文 献

为什么要写信给毛主席彭德怀(1)

回 忆 录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反摩擦斗争

.....耿 飏 贺晋年(8)

陕甘宁边区工业的发展李 强(30)

回忆延安《解放日报》田 方(37)

人 物 介 绍

庐山会议与彭德怀.....王 焰(47)

专 题 资 料

1959年庐山会议记事陈诗惠(111)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东北问题上三国四方

的关系和斗争金蕴芳 丁晓春等(150)

太岳革命根据地发展概述.....师文华 卢海明(180)

1936年广东省党组织的重建和南方临时
工委成立始末

.....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217)

史实考订

李富春、蔡畅由法国赴莫斯科时间考

..... 阎永雪 (232)

转 载

彭德怀同志视察敦煌小记 王文焕 (235)

为什么要写信给毛主席*

彭 德 怀

1959年7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信，是为了将我接触到的各方面材料，如各地群众来信和军队内部的反映；同张闻天、周小舟谈话；小组会的讨论；庐山食堂的议论；《内部参考》；特别是中央印发的《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关于贯彻执行1958年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草案）》，《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分析》（载1959年6月29日《宣传动态》）以及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经过阅读与同志们交谈，加以初步分析，形成的概念，反映给毛主席。

我国自1958年执行总路线以来，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跃进的方法，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是合适的。但是大跃进的速度，究竟宜有多大呢？是一年翻一番，两年或三年翻一番，或者是四年翻一番呢？经过第一个五年（1952年—1957年）和1958年大跃进的实践和努力证明，一年翻一番是绝对不可能的。两年翻一番，也是有严重困难的。1958年至1959年上半年，这样高速度的建设是难以继续持久的。苏联采取五年计划、即五年翻一番，这样的速度，要求国民经济的发展，每年平均递增

* 本文节自彭德怀1959年7月—8月间出席庐山会议期间和会后所写的笔记，只对个别文字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并划分了段落，余均保持原貌。

14. 87%。根据苏联经验和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论述，每年平均增长13%至14%，这是最低速度。我国比苏联可能要快一点，因为我国的条件比苏联当时所处的环境要好些，人力也更强大得多。究竟能快多少呢？如四年翻一番，每年平均递增18.93%。如三年翻一番，每年平均递增26%。我国工业建设应当努力争取在三至四年间翻一番，如果这样做是可能的话，就可提出四年翻一番，争取三年或者三年半完成。似此，既紧张又留有余地，避免大马鞍形。争取高速度的发展经济计划，没有一个比较合乎实际速度的标准，计划工作就不能不是随波逐浪的被动形势。这是工业方面要有一个标准，在农业方面也要有一个合适的标准。我国解放以来，总起来看，农业每年平均能够递增5%到7%就很不错了。这是就现在条件和逐步改善技术措施来说的。至于将来农业机械化、水利、肥料条件大大改善后，也有可能比现在增产速度要大得多。

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中和某些个别政策上是存在着求成过急‘左’的倾向的。不平衡的现象相当普遍的存在，如不迅速加以纠正，将要动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继续发展和巩固。特别是当前工业和农业关系的紧张局面，事实上农业远远落后于工业。这不仅将要影响到城市和农村的主副食品，而且会影响到轻工业原料；影响到国内市场和物资出口；影响货币回笼，也就是周转率缓慢，以致影响财政收入和货币信任。有同志说：“财政有结余，没有问题！”根据事实分析，财政不是没有问题，财政问题是在严重不平

衡的经济发展中潜伏着。要想财政真正没有问题，是建立在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相对平衡的基础上；进口物资和出口物资相对平衡的基础上；国内市场相对稳定的基础上；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相对平衡的基础上。只要上述哪一方面失去相对平衡，发生严重不平衡现象，就会影响市场、影响财政收入、影响基本建设投资。^⑤如果超过市场回笼货币收入时，不仅会影响财政收入，而且会影响货币贬值。“财政没有问题”的乐观主义者，不愿意研究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中潜伏着的财政问题。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最基本的还是靠人力劳动，可是农业劳动力极为紧张，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是很不利的。我国从解放以来，自然气象是：三年中有一年是丰年，一年是平年，一年是歉年。即1952年是丰年，1953年是平年，1954年是歉年，又1955年是丰年，1956年是平年，1957年是歉年。过去是以丰补歉，而1958年是一个特大的丰年，由于各种原因，使它收获得不好，保管得不好，以及多吃等浪费，造成了丰年不丰收。如果过去几年自然气象是规律性的话，那么，1959年是一个平年，1960年将是歉年。真的如此，我们当前的困难将要增多，而不是减少，时间将要延长，而不是今年秋后即可好转。即使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工作中偏差，农村中所遭受共产风的破坏，也需要有两年才能恢复到1958年夏季以前水平。至于耕牛的死亡，树木的砍伐，要恢复那是几年和十几年的事。现在并没有多少同志来注意这些情况，而是盲目乐观，盲目地扩大基本建设，过多的调走农业劳动力，口头上是在强调工农业并举，而

事实上是忽视工农业并举，忽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1958年人民公社化，那一股共产风冲击和搞乱所有制，错误地把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管理区的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几乎都变为公社所有制，造成穷队与富队之间，贫农与中农之间，干部与农民之间，同时紧张。对于自留地也是几收几放，增加了农民对发展生产的顾虑，人心不安，大量农民自发地流入城市，这一切当然会打击农民生产情绪，必然会造成减产的效果。上述这些错误和缺点，虽然经过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上海六中和七中全会，以及1959年4月22日发出《党内通讯》，总的说来，‘左’的倾向基本上得到了纠正，未酿成动摇总路线的错误，也没有打击那些真正热情高涨的干部和群众，而且使他们得到了教育，这当然是一个很大胜利。但是到现在为止，并不是所有地区和所有部门都纠正了，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左’的倾向还在继续存在和发展，³特别是共产风所带来的严重强迫命令，浮夸虚报，脱离群众等现象是异常严重的。某些个别县要在两三年之内单独进入共产主义。相当多的地区，实行大兵团作战，不计报酬，违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按男女强弱分编劳动大军，而不是强弱搭配。根据我国农村现在生产条件，这样的分工和组织是很不适当的。为了急于建新居民点，事先拆毁房屋，新居民点尚未着手建设，旧有房屋已经拆毁不少。为了炼铁，捣毁铁锅和农具，这些现象决不是正常的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¹这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出身未改造好的干部，被过去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些人对农业生

产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性。由于过高的估计亩产量，不少地区过早的进行园田化，以1/3土地耕种，1/3土地停荒（即休耕，编者注），1/3土地植树木花草以供观赏，把远景规划当作行动口号。在这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影响下，³以及农村中劳动力不定等等原因，致使1959年春播面积，比1957年减少9000万亩左右。1958年大跃进，农业也是特大丰年，但因各种浪费，库存粮食没有任何增加，而且减少了！这种情况，如果一旦遭遇较为严重些的自然灾害，将要出现相当范围的饥饿危险。

工业方面主要是基本建设范围太宽，投资过多，材料缺乏，又加上分散使用，许多限额以内的工厂半截停建，或者停工待料。许多非生产性的建设可以缓建，甚至几年之内可以不建，但是急如星火，拼命赶工建成。原料生产建设一般落后于加工业，使许多加工工厂经常吃不饱或技术太差，不能不停工，结果修制两误，职工也增加过多，不少工厂人有备份，工资总额直线上升，但原材料均无储备，一失平衡，不能马上调整，结果是资金积压，浪费很大，成本过高，不合乎多快好省的要求。

对外贸易，出口过多，并且一度在国外采取倾销政策。在我国现在物资基础这样薄弱时，这样做是不对的。而且对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都是不利的。如为了完成猪肉出口任务，规定农村三个月不杀猪，这样做不仅不能多出口猪肉，反而会打击农民养猪的积极性，这于发展养猪不利，也就会减少猪肉出口。

在全民办教育的口号下，入学人数成千万地增加，

这当然是好事。但在生产技术没有得到大量改革，生产力没有显著提高以前，占用过多的劳动力，过多的人员脱离生产，这与我国当前的经济条件是不相适应的。将会影响生产，影响人民生活，妨害大跃进，也就会真正妨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无人售货也几乎成为运动，在全国各地都有，特别在北京市区和郊区，是很普遍的。在各机关、团体、学校、工矿企业单位，所有采用无人售货者，没有一个不是赔钱的，少则千元，多至万元。某些单位反映经营不错，但不反映真实情况。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很多的，最直接的原因是离开实际，实际上也是离开物质基础的抽象的社会观，忽视社会待遇的实际差别的存在，是唯心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为什么是特殊表现呢？因为它是在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共产主义风格等美名誉词的掩饰下进行的，只要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就可以扣上你不相信群众觉悟的大帽子，谁也就不敢提意见了。群众觉悟是否提高了呢？回答是肯定的，比解放以前大大提高了，但没有提到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无人售货那样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风格有没有呢？有！要不要呢？要！回答都是肯定的。而且有不少共产主义风格的先进人物，越多越好。现时这些先进分子，在绝对数字上是不不少的，但是在相对数字上，所占的百分比还是很少的。只有这些先进分子占多数时，还要加上从经济发展状况去考虑，在这两方面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做到。无人售货是将来的事，不是现在就能做得到的事。

抢先思想，争先恐后的放卫星，报捷报喜，以少报多，以劣报优，甚至以无报有，这样的浮夸风气是普遍存在的。还有某些同志认为‘左’比右好，左是小资产阶级的方法问题，右是资产阶级的立场问题。在公社、大队、生产队，党内严重缺乏民主生活，这一问题在地委和县委两级也是值得注意的。还有任务繁重，什么都要第一书记挂帅。造成严肃认真负责者，忙乱不堪，疲倦已极；官僚主义者，置若罔闻，其结果都是办不好事情的。要完全纠正‘左’的现象，克服歪风，还要用一把大力才行。以上这些就是我7月14日写信给主席的原因，也可以说这就是动机。我想把这些问题用写信的方式，大纲式的写给毛主席作参考。有无参考价值，请主席斟酌。我没有想到主席会把此信印发到会同志，如果我当时想到写信会要印发的话，那我就要尽可能地斟酌和分析一下。我在当时也看到有右倾萌芽，但认为‘左’还是主要的，这封信印发后，我17日看到，19日就在小组会上做了说明，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有些没有完全写明本意和不大符合逻辑的地方，建议中央办公厅在会议后，将此信收回，不要下发。此时，我还不知道中央常委会已经决定要开中央全会。我为什么要仓促写这封信呢？是听说15日即要闭会了，我12日上午想到主席处谈谈就算了，走过去时，警卫人员说，主席刚睡，我回居住地后，仍去参加小组会。13日晚间便写成此信，14日送给主席的。我认为有不同意见，不应该隐瞒，写信或当面说是应该的，有错误公诸讨论也是应该的。

抗日战争时期

陕甘宁边区的反摩擦斗争

耿飫 贺晋年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成为全国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又是八路军、新四军抗日的总后方，为国内革命人士所向往，世界进步力量所瞩目。当时，国共两党第二次实现了合作，国民党政府也被迫承认了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然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他们很清楚，陕甘宁边区是其继续推行反共政策的最大障碍，故视边区如背上之芒、肉中之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在整个抗战时期，他们对边区始终采取军事上包围，政治上打击，经济上封锁的政策，企图以此来削弱、扼杀边区，并伺机发动武装进攻消灭边区。

抗战开始后，根据两党达成的协议，我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于1937年秋开赴华北敌后，对日作战。在陕甘宁边区仅留下少数留守部队，总兵力仅1.5万余人。当时国民党当局并不给我们这些留守部队的领导机构以统一的番号和委任领导人员，我们即以八路军留守处的名义组建了留守部队领导机构——留守兵团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参谋长曹里怀、政治

部主任莫文骅），并先后成立了绥德、关中、陇东、三边和延属五个军分区（警备区）。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对我边区包围、侵扰情况的发展，我八路军留守部队的编组情况也有所改变，兵力也有所加强。但就军事力量的对比来说，^⑨我边区始终处于明显的劣势。我们仅有的这些留守部队和边区保安司令部的保安部队，既要保卫从宜川到神府一线的千里河防，阻止日寇的西进，又要对付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侵扰，任务十分艰巨。因此，在整个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一直处在险恶的环境和严重的入侵威胁之下。

（一）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了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乘机将其政策的重点由消极抗日逐渐转向积极反共反人民上来。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公然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同年2月，蒋介石又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从此，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活动更为猖獗。同年底，蒋介石、阎锡山在晋西北集中六个军的兵力向我党领导的新军（抗日决死队）发动进攻，制造了“十二月事变”，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陕甘宁边区是这次反共高潮中武装进攻的重点地区之一。在这段时间里，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采取各种手段，肆意制造摩擦事件。他们大举入侵，夺地掠城；派遣和纵容土匪抢劫骚扰；乱捕乱杀我地方干部和群众；

收卖我方人员刺探军情，阻扰我军在募补区募兵征粮，大肆进行反共宣传，欺骗群众，蛊惑人心。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些罪恶行径，对我边区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制造了大小几十起军事摩擦事件，其中较为突出的是：陇东分区的两次事件；关中分区的旬邑事件和淳化事件；绥德警备区的国民党专员何绍南的叛乱事件，等等。

陇东分区，东连陕西，西北接宁夏，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初期，我方在陇东仅留下了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政委甘渭汉、副旅长耿飚）旅部及其七七〇团（团长张才千）、由延安警备部队派出并加入三八五旅建制作为预备队的警备第二团（团长周求保）、教导师袁国平部的全部与环县、曲子、华池等县保安队合并改编成的警备第七团（团长袁渊），以及边区保安司令部所辖的一个军分区独立营和几个县的保安队。这些正规部队和地方部队合计起来，才4000人左右。陇东分区未专门设立军分区机构，由三八五旅兼军分区。

两次陇东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有计划、有预谋挑起的。早在1938年12月，国民党第一六五师就曾袭击我庆阳之白马铺、赤城镇一带的驻军，并扬言要消灭我陇东的八路军。自此之后，驻西峰镇的国民党甘肃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即西峰公署）专员钟竟成即对我陇东分区有计划地进行反共活动：破坏我群众组织，封锁我军粮草，公开进行反共宣传。

1939年1月间，国民党镇原县县长邵介民在群众大会上公然叫嚣“接近八路者是汉奸”，并采取挑衅行为，捕押我方的民运工作人员。4月初，“西峰公署”派保安队在南三镇绑走我方人员10名，我方当即向“西峰公署”，并电兰州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提出抗议，然无结果。9日晚，我三八五旅亦派兵将国民党太平镇区的一名区员和义警队长扣押，作为警告措施，此后，国民党保安队接连不断地在各地捕押我方人员，于是形势日益紧张。10日，朱绍良密电驻西峰镇的一六五师师长，令其派部队进犯我镇原县。该师随即派出部队会同保安队，向我七七〇团三营驻防的镇原县城开进，造成围城态势。我三营闭城自卫，力求以谈判来解决争端。我留守处主任肖劲光也急电蒋介石、朱绍良、程潜，要他们制止国民党部队的军事行动，由国共双方派员商谈，以免事态扩大。到5月初，国民党当局才同意谈判，镇原事态暂告平息。

镇原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一再胁迫我宁县驻军七七〇团二营撤走。我二营当然不予置理。不久，国民党一六五师的三个骑兵连突然开至宁县城郊，4月29日，方振武亲率保安队及壮丁队共700余人，向我二营发动攻击。二营奋起自卫，经两天三夜的激战，将敌人击溃，并将方振武及其残部包围在城中一幢楼内。预布在城外的敌骑兵连乘势攻城，我二营闭城坚守，待命解决。直到5月中旬，在我方代表向“西峰公署”再三抗议下，对方见势不利，始将三个骑兵连撤走，宁县事件暂告解决。

在镇、宁两县事件尚未彻底解决之际，国民党顽固派却又在筹划新的摩擦事件。1939年9月中旬，经朱绍良与驻平凉之第九十七师师长韩锡侯、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钟竟成的策划，第二次陇东事件就从宁县开始，很快扩展到陇东各县。12月10日夜，国民党九十七师五七八团纠合保安队突然袭击我驻宁县的七七〇团二营，因我军无防备，伤亡大半，仅一小部突出城外，战斗至1940年1月，我军被迫撤出宁县全境。12月16日，国民党第九十七师两个营纠合几个县的保安队围攻我镇原县城内的三营。因敌我力量悬殊，三营于是日晚间突围出城，移驻孟坝，镇原县城遂被国民党占领。1940年元旦，国民党环县保安大队副土匪头子赵思忠（绰号赵老五），率部80余人并迫使壮丁数百名侵入我环县洪德区，抢占该区三个乡，残杀我地方干部数名。后赵匪窜至环县北门外，被我保安队及警卫队击退，赵匪败退后，乱窜于洪德、虎洞等六个区之间，肆无忌惮地抢掠残杀我干部和群众，肆虐达一个月之久，环县人民恨之入骨。我陇东分区领导为巩固抗战后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调派警备二团，于2月16日出动进剿，至3月7日，将赵匪的巢穴全部摧毁，赵老五率匪徒12人逃脱，余匪全部就擒。与此同时，我警二团还击溃了暗藏在我环县车道区内的国民党固原县政府爪牙张廷杰，解决了由张煽动的我自卫军900余人的叛逃事件。2月中旬，我军一部曾在正宁县平子镇与国民党保安队激战两天，尔后退出了正宁县。这样，经过第二次陇东事件，国民党侵占了我镇原、宁县、正宁三个县；我亦歼灭了庆阳、合水两县城

内的国民党保安部队300余人。

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从地理位置上看，它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从延安到关中，要通过黄陵、店头一带的一条几十里长的狭窄地带，边区军民把它叫做“葫芦把”把关中地区叫做“宝葫芦”。国民党顽固派对我边区的这个“宝葫芦”早已垂涎三尺，总想先把它吃掉，然后侵吞整个边区。因此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对关中分区的武装的和非武装的破坏活动一刻也没停止过。我方在关中分区的兵力很弱，原先只有保安独立一营（营长高步云）和保安独立二营（营长张占云）两个营，以及几个县大队，后因摩擦不断升级，才调进保安独立三营（营长贺吉祥）。而他们面对着的却是胡宗南的20万正规军。

在这次反共高潮中，胡宗南借口“西安事变”前关中一带是东北军的防地，应再由国民党军队驻守，因此不断在关中地区制造摩擦事件，企图蚕食边区。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6月，武装进攻高达64起，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旬邑事件和淳化事件。

1939年5月下旬，我八路军荣校（残伤军人学校）一名上士路过旬邑县城时被国民党暗杀队杀害。我驻旬邑县城的独一营和荣校代表再三要求国民党县长惩办凶手不成，我荣军一个排开进县城，遂即发生武装冲突。国民党县长调集邻近几个县的保安大队，会同国民党保六团一营围攻我保安独一营和荣军排，激战7天8夜，终因寡不敌众，我保安独一营被迫撤出旬邑县城。为此事件，留守处主任肖劲光曾致电蒋介石和程潜等人，要求严惩

枪杀我荣军的凶顽，停止进攻我八路军驻地。

关中分区的淳化县城建在南北走向的大沟里。当时，我保安独二营驻在县城的南关，国民党军队驻北关，北关比南关地势高，两关相距仅200米左右，国民党军队居高临下，不时向我哨棚扔砖石，继而发展到摸岗哨、烧哨所、打冷枪，进行各种挑衅活动，企图逼我军退出县城，我保安独二营与其作了针锋相对斗争。1940年3月下旬，胡宗南突然派其二十四师围攻我保安独二营，打了2天，在平时与我关系较好的国民党保九团一个营严守中立的情况下，我保安独二营始得顺利撤出淳化城，回驻马家堡。

到此，国民党顽固派通过在陇东和关中地区制造的这几次摩擦事件、侵占了我镇原、宁县、正宁、旬邑、淳化等5座县城和6个区43个乡的地盘。

虽然如此，在这次反共高潮中，我军则被迫进行了一系列反摩擦斗争，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1940年春夏，我关中分区保安独三营和警备八团一部，进行了店头镇突围战和井村、转角镇等多次战斗，收复了马栏镇，拔掉了对方10多处据点，消灭了国民党旬邑县保安团团团长、土匪头子郭相堂和淳化县保安大队长李养之两股匪徒共1000多人，粉碎了顽固派妄图打通淳旬线、马（栏）旬线，建立碉堡封锁线，紧缩我活动范围的阴谋。这些胜利使胡宗南部队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

绥德警备区，地处黄河之滨，东接山西，西连宁夏，北通内蒙，是延安通往华北、华日抗日根据地的门户，又是延安的屏障，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该区

所属之绥德、米脂、佳县、吴堡和清涧五县的大部分农村，原系苏区，抗战开始后，根据两党达成的协议，将绥德五县划为警备区。警备区由陈奇涵任司令员，指挥我留守部队七一八团（团长文年生）、警备一团（团长贺晋年）和警备三团（团长阎红彦）负责河防。而国民党当局的政权组织，既不撤走，又不改组，反而不断加强其反动统治，委派反共专家何绍南来绥德任行政督察专员。这个曾被毛主席当面斥责为“摩擦专员”的何绍南，一到绥德，表面上大唱团结合作的高调，背地里却大搞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他们在各县组织了暗杀队、石头队、棒子队，还有什么“板子”（娼妓）队，对我驻军大搞暗杀、破坏和特务活动，不断制造摩擦事件，而且唆使联保长和劣绅们不售给我粮草，胁迫群众不与我接近；纵容土匪抢掠骚扰群众，事后又嫁祸于我，阴谋挑起群众对我军的不满情绪。何绍南一伙妄图用这些手段迫使我军退出绥德地区，以达到其独霸该地区，截断我党中央与其他抗日根据地之联系的阴谋。

起初，我警备区首长和各团领导，为维护团结抗日，对何绍南一伙的反动行径，力求通过谈判来解决，故曾多次找何绍南本人及其他头面人物商谈，晓以民族大义，要求他们放弃摩擦，一致对外。但何绍南及其党徒视我们为软弱可欺，仍然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公开进行反共活动。这样，我们不得不改换斗争方式。从此，无论在群众大会上，还是在谈判桌上，或是在请客席上，他们就与何绍南一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他们的反动言行，予以无情的驳斥和彻底的揭露。各部